奴隶贸易与非洲国家建构*

——基于混合方法的实证考察

黄振乾

【内容提要】 奴隶贸易是一道深刻的历史伤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作者以政治信任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关于奴隶贸易与国家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奴隶贸易如何塑造非洲政治生态与国家建构进程问题。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外部冲击，通过奴隶经济的驱动，在非洲社会内部引发了连锁反应。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逐渐演变为掠夺性政体，以暴力获取奴隶来维持其统治。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则沦为被掠夺的对象，甚至被迫参与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加剧了非洲的社会冲突，也破坏了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削弱了民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可与信赖。奴隶贸易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对非洲国家建构形成了严重制约。作者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奴隶贸易与非洲国家建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定量研究表明，在非洲历史上奴隶贸易强度高的族群地区，其民众当下的政治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定性研究主要通过四个案例揭示了奴隶贸易破坏政治信任的具体过程，表明奴隶贸易带来的历史创伤是非洲现代国家建构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为理解非洲国家建构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视角，也为非洲国家通过重建政治信任推动国家建构提供了政策参考。

【关键词】 奴隶贸易；国家建构；政治信任；混合方法；非洲研究

【作者简介】 黄振乾，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5）01-0088-35

* 本研究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才培育发展支持计划的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的“奇博克绑架事件”震惊了世界。极端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袭击了尼日利亚波诺州奇博克镇的一所中学，强行掳走 276 名女学生，并扬言要将她们作为奴隶进行贩卖。[①]“博科圣地”频繁出没的尼日利亚东北部恰好也是历史上非洲奴隶贸易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②]“奇博克绑架事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该地区暴力掠奴的历史传统，如 19 世纪的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就采取类似方式进行掠奴活动。无独有偶，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南部，奴隶贸易在 20 世纪末依然盛行。[③] 科特迪瓦导演罗杰·姆巴拉（Roger M'Bala）曾拍摄过一部基于西非奴隶贸易的真实历史影片《阿丹格曼》，该影片生动再现了 17 世纪奴隶贸易的残酷场景：酋长为了财物与武器，指挥士兵抓捕族人并进行贩卖。然而讽刺的是，这位酋长在一次醉酒后也被自己的族人捕获并被卖往美洲的圣路易斯。影片《阿丹格曼》深刻揭示了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巨大创伤，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掌权者，他们最终都无法逃脱这场由奴役与剥削编织的“牢笼”。

奴隶贸易曾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而非洲无疑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奴隶贸易地区之一。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造成的深重桎梏成为非洲国家发展的一大阻碍。除了众所周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洲还经历了跨撒哈拉、红海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非洲人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主要受害者，被大规模贩卖至欧洲、阿拉伯半岛和美洲。奴隶贸易对全球历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奴隶贸易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非洲经济落后的作用，但对其如何塑造非洲现代国家建构等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此外，既有研究普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两方面局限性：一是过度依赖定量分析，忽视了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复杂性；二是单纯采用定性研究，缺乏广泛数据支撑，难以全面揭示奴隶贸易对非洲国家建构的影响。

深入探讨奴隶贸易对非洲国家建构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

---

① 参见“Boko Haram ‘To Sell’ Nigeria Girls Abducted from Chibok,”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7283383。

② 尼日利亚东北部卡努里族（Kanuri）输出的奴隶数量超过 53 万人，在所有非洲族群中位居第六。参见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24, DOI: 10.1098/rstb.2023.0032。

③ 国际组织曾通过赎买方式解救了一万多名当地奴隶，参见 John Eibner, “My Career Redeeming Slaves,”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6, No.1, 1999, pp.3-1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以政治信任为切入点，将奴隶贸易和国家建构关系进行理论化。大规模奴隶贸易不仅催生了非洲本土的奴隶经济，使部分政治精英卷入并从中获利，还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进而削弱了民众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这种信任缺失通过空间固定效应延续至今，成为非洲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枷锁。为揭示奴隶贸易遗产的复杂性与延续性，本文通过将定量分析与案例比较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奴隶贸易与非洲国家建构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层面，本文检验了奴隶贸易与民众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在案例分析层面，本文选取了塞古班巴拉（Segu Bambara）、奥约（Oyo）、迪奥拉（Diola）和桑给巴尔（Zanzibar）四个代表性案例进行考察。[①] 此外，笔者还通过多种途径搜集资料，如在非洲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Bagamoyo）进行短期实地调研，获取了奴隶贸易的相关资料。此外，笔者还通过访谈和问卷调研，收集并整理了非洲民众对奴隶贸易认知以及当地政府政策的相关信息。

二、重新审视奴隶贸易的历史性作用

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密切相关，奴隶制的存在催生了奴隶贸易。虽然关于非洲奴隶制的起源尚存在争论，但非洲在被殖民前就存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已是学界的共识。[②] 奴隶制曾以不同形式广泛存在于非洲社会。奴隶制主要包括两类具体形式：一是基于家庭的低强度奴隶制（如奴隶承担家务劳动）。二是使用奴隶进行经济生产的高强度奴隶制（如种植园奴隶制）。[③] 低强度奴隶制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传统阶段，而高强度奴隶制出现在近现代。在大规模海外奴隶贸易兴起前，非洲本土奴隶贸易主要服务于低强度奴隶制经济。

根据地域划分，非洲曾有过四类地区性奴隶贸易：一是跨撒哈拉奴隶贸易。奴隶贩子将撒哈拉以南的人口运至北非，再贩卖到地中海和中东。此类奴隶贸易可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埃及国王从尼罗河流域掠奴。二是红海奴隶贸易。奴隶贩子将非洲人口经红海贩卖到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地区，该过程一直持续至 20 世纪 60 年代阿

① 塞古班巴拉和奥约是因奴隶贸易而兴起的非洲王国（掠夺性政体），在奴隶贸易之前，创立塞古班巴拉和奥约的族群已具备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与此不同，迪奥拉既非国家，也非掠夺性政体，而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族群。桑给巴尔主要作为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本文从据点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

② Paul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Sean Stilwell, *Slavery and Slaving in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9-2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拉伯国家废除奴隶制。三是印度洋奴隶贸易。这类掠奴行为始于公元前 2500 年，奴隶主要来自东非地区，他们被贩卖到中东、印度洋岛屿、印度次大陆和爪哇地区，有些奴隶后来也被运往美洲种植园。四是始于 15 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美洲种植园和矿山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殖民者便从非洲贩奴，通过大西洋航线运至美洲。大西洋奴隶贸易因高强度奴隶制的迅速兴起，导致至少有 1200 万非洲人口被运出非洲（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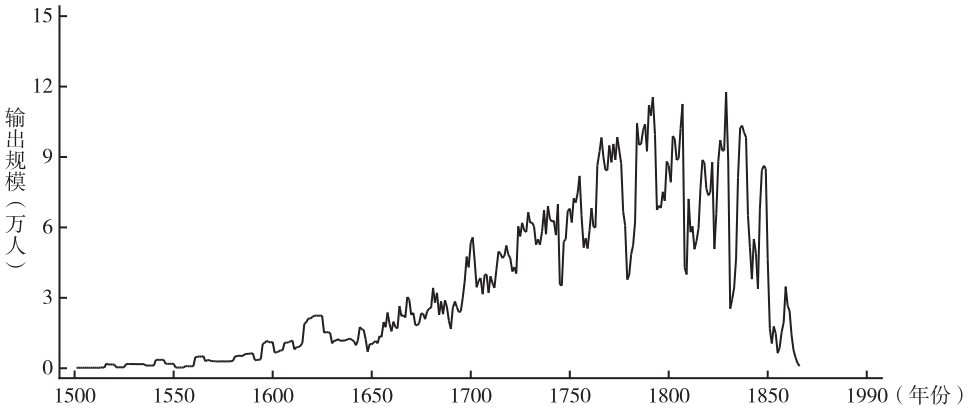

图 1　大西洋奴隶贸易规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绘制，参见 David Eltis，“Voyages：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 https：//www.slavevoyages.org/voyage/about#methodology/introduction/0/en/。

奴隶贸易的缘起及其影响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理查德·罗伯特（Richard Robert）指出，奴隶商品化是非洲掠奴国家兴起的根本原因。① 由于非洲农业技术（如犁的使用）水平有限，定居农业发展缓慢，加之地广人稀，人口而非土地成为非洲的稀缺资源，进而导致人口成为统治和财富的基础，这也是导致奴隶商品化的重要原因。② “人口财富（wealth-in-people）”是测量传统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方法。③

① Richard Roberts，*Warriors*，*Merchants*，*and Slaves*：*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1700-191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② Richard Roberts，“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Warrior States：Segu Bambara and Segu Tokolor，c. 1712-189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 13，No. 3，1980，pp. 389-419.

③ Jane I. Guyer，“Wealth in People，Wealth in Things-Introductio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36，No. 1，1995，pp. 83-90；Ewout Frankema，Michiel de Haas and Marlous van Waijenburg，“Inequality Regimes in Afric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African Affairs*，Vol. 122，No. 486，2023，pp. 57-9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有研究发现，自然因素（如极端气候）与奴隶贸易也可能存在关联。[①]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前，非洲本土的奴隶经济相对有限。大西洋奴隶贸易改变了非洲较为温和的奴隶贸易形态，将其卷入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

奴隶贸易的影响是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议题。[②] 正如历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所描述的："携带朗姆酒、枪炮、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扰内地获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了控制这种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则日渐衰落"。[③] 在输入地一端，研究者往往聚焦奴隶贸易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提出了"威廉姆斯假说"，即奴隶贸易使欧洲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进而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④]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支持者则指出，作为世界体系核心的欧洲，其发展建立在对边缘地区（如第三世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基础之上。[⑤] 其他研究也通过量化方法证实了这一假说，如英国将奴隶贸易获得的财富投入工业生产，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⑥]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和内森·纳恩（Nathan Nunn）。罗德尼认为欧洲奴隶贸易是非洲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因素；纳恩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奴隶贸易对当今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⑦] 其他研究者还分析了奴隶贸易对当代非洲政治经济不平等、"一夫多妻"制、性别角色、暴力冲突和族群格局等方面

---

① Levi Boxell, "Droughts, Conflict,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7, No. 4, 2019, pp. 774-791.

② 中国的非洲学研究者已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多以史实介绍为主。参见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36 页；李安山：《非洲现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1—39 页。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 页。

④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Stanley L. Engerman, "The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omment on the Williams Thesi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 46, Issue 4, 1972, pp. 430-443;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eph E. Inikori, "Atlantic 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Capitalist Global Econom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61, No. S22, 2020, pp. S159-S171.

⑤ Immanuel M.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⑥ Stephan Heblich, Stephen J. Redding and Hans-Joachim Voth, "Slavery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30451, 2023.

⑦ Walter Rodney,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Nathan Nunn,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1, 2008, pp. 139-17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影响。①

纳恩和伦纳德·旺切康（Leonard Wantchekon）分析了奴隶贸易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他们通过分析受访者对亲人、邻居、社群成员和地方委员会的信任程度，发现奴隶贸易显著降低了受访者对上述对象的信任。② 与该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目的、考察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皆存在明显差别。首先，在研究目的上，纳恩和旺切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识别奴隶贸易对社会信任的因果效应，但对其中的复杂机制着墨较少，本文则尝试构建奴隶贸易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理论框架，系统分析其影响路径。其次，在考察对象上，纳恩和旺切康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奴隶贸易的社会影响（社会信任），本文则更加关注其政治影响（政治信任）。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纳恩和旺切康采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强调因果识别，而本文则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定量分析和案例比较，同时使用了查阅档案、访谈和实地调研等方式，旨在获得更多维度的证据。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更多集中于讨论奴隶贸易对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少关注奴隶贸易与国家建构间的关系。一方面，尽管历史学者探讨了奴隶贸易如何塑造非洲的“战士国家”并推动形成政治集权等议题，但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史料与个案分析，缺乏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及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另一方面，既有文献在变量界定和因果机制识别上尚不清晰，对奴隶贸易如何长期影响国家建构的具体路径缺乏细致描述。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呼吁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推进奴隶贸易、国家建构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研究。③ 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关于奴隶贸易与国家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

① 参见 Ewout Frankema, Michiel de Haas and Marlous van Waijenburg, “Inequality Regimes in Afric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p. 57-94; John T. Dalton and Tin Cheuk Leung, “Why Is Polygyny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frica? An African Slave Trade Per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62, No. 4, 2014, pp. 599-632; Edoardo Teso, “The Long-Term Effect of Demographic Shocks on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Roles: Evidence from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7, No. 2, 2019, pp. 497-534; Zhang Yu, Xu Zhicheng and Shahriar Kibriya,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Slave Trade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9, No. 3, 2021, pp. 776-800; Warren Whatley and Rob Gillezeau, “The Impact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on Ethnic Stratification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No. 3, 2011, pp. 571-576。

② Nathan Nun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No. 7, 2011, pp. 3221-3252.

③ J. C. Sharman, “Something New Out of Africa: States Made Slaves, Slaves Made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 3, 2023, pp. 497-526; J. C. Sharman and Ayşe Zarakol, “Global Slavery in the Making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8, No. 2, 2024, pp. 802-81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奴隶贸易、政治信任与非洲国家建构

（一）奴隶贸易前的非洲社会

甄别奴隶贸易开始时的非洲社会形态是本文讨论的起点，也是本文理论拓展的突破口。[①] 奴隶贸易开始时的非洲社会并非铁板一块。不同非洲社会群体对奴隶贸易的反应存在差异，因而也导致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政治后果。在亚洲和欧洲的相关国家进入王朝更替时，非洲并不存在类似的政治形态，[②] 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非洲大陆在欧洲国家对其殖民之前并没有孕育出现代国家，尽管出现过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实体，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属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有限国家地区（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不少地区还处于“无国家实体（stateless societies）”的形态。[③] 第二，欧洲殖民前的非洲社会单位以部落和酋邦为主体。部落以松散的聚落方式组成，其空间范围和组织化程度较为有限。酋邦是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实体，仅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组织形态。酋邦之上则为少数非洲王国，这些王国虽然具有较固定的领土范围且组织化程度也较高，但与中国这样的王朝国家相差甚远。[④] 第三，在组织化程度低的非洲社会中，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和宗族关系是政治秩序的基础。[⑤]

非洲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在面对奴隶贸易冲击时便产生了意外性后果。奴隶贸易对非洲本土社会而言可视为被迫卷入外部体系。其中，大西洋奴隶贸易因其规模和强度使整个非洲被迫卷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奴隶贸易作为外部冲击引发了非洲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摧毁了原有的政治社会关系并重构了非洲的政治格局，最终塑造了非洲国家建构的历史轨迹。

---

① 有关初始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参见 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and Social Analysi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② 有关非洲国家建构的特殊性，参见 Jeffrey Herbst，*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闫健：《本土社会与外来国家：非洲国家构建的社会逻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 年第 4 期，第 158—167 页；张长东、刘瑾：《非洲的国家建构历史与“失败国家”》，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1 辑，第 7—28 页。

③ Thomas Risse，ed.，*Governance Without a State?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Meyer Fortes and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eds.，*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④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eds.，*Origins of the State：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78.

⑤ Henry Sumner Maine，*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Henry Holt and Company，1875；George B. N. Ayittey，*Indigenous African Institutions*，Transnational Publishers，2006；何增科：《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载《中国政治学》，2022 年第 3 辑，第 3—85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二）为何以政治信任为切入点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其所在的政治体系（政治权威、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等）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越高越有利于国家建构和治理。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建构具有丰富内涵。传统研究往往将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视为国家建构的内核。① 随着研究议程的不断推进，族群权力关系、民族主义、国家认同和政治信任等议题日益成为学界探讨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

政治信任在国家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有三点：第一，政治信任是政治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石。有研究表明，正是政治信任而非政治暴力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建立。② 第二，政治信任是筑牢共同体政治秩序的前提条件。历史上因缺乏政治信任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事件屡见不鲜。在当下的西方国家中，民众政治信任的衰退也引发了学者对“民主危机”的讨论。③ 第三，政治信任影响国家治理绩效，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反过来也能对国家建构产生影响。④

政治信任的缺乏在非洲国家建构中成为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受殖民主义和国际体系影响，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经历了先有国家再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这种“逆向”的国家建构路径也为本文将政治信任作为非洲国家建构的切入点提供了依据。欧洲的现代国家建构一般基于社会群体的政治信任，或通过国家建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信任。相反，非洲现代国家的形成则是外部干预（特别是欧洲殖民）的结果，非洲国家的建立缺乏必要的政治信任基础，并不是“成熟”的现代国家。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至今皆为“法律国家”而非“实质国家”。⑤ 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获得独立后，虽然以国际法的方式确立了各国的国界和国家主权，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其领土进行有效治理。另一方面，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国家的政治信任显著较低，分析其成因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由于当下非洲国家并不具有足够的政治信任基础，国家建构的其他维度（包括权力渗透和国家认同）需要与塑造民众的政治信任同时进行。本文将政治信任作为

---

① Catherine Boone, *Political Topographies of the African State: Territorial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effrey Herbst, *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 pp. 11-32.

②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andom House, 1962, pp. 22-40.

③ Tom W. G. van der Meer,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R. J. Dalton,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④ Ji Chengyuan, Jiang Junyan and Zhang Yujin, “Political Trust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the Time of COVID-19,” *World Development*, 2024, DOI: 10.1016/j.worlddev.2023.106499.

⑤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Why Africa's Weak States Persist: The Empirical and the Juridical in Statehood,”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1, 2011, pp. 1-2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连接奴隶贸易和非洲国家建构的关键变量，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政治信任在理论上与奴隶贸易带来的一系列因果效应密切相连。第二，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变量可以影响民众政治行为，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可以较好地捕捉奴隶贸易带来的影响。第三，政治信任作为国家建构变量具有可操作性，相关数据较为丰富，能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①

（三）奴隶贸易、政治信任与国家建构的理论分析

以政治信任为切入点，本文建构了一个解释奴隶贸易和非洲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如图 2）。以大西洋奴隶贸易为例，自殖民主义时代开启后，欧洲人在美洲建立了大量种植园，随着种植园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由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本土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他们转而从非洲购买奴隶，大西洋奴隶贸易随之兴起。奴隶贸易刺激了非洲本土奴隶经济。奴隶贸易虽然为非洲精英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但也引发了非洲社会的冲突与政治分化。虽然奴隶经济对不同组织形态的族群影响路径存在差别，但最终皆破坏了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削弱了民众对政治权威的信赖。奴隶贸易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对非洲国家建构进程构成诸多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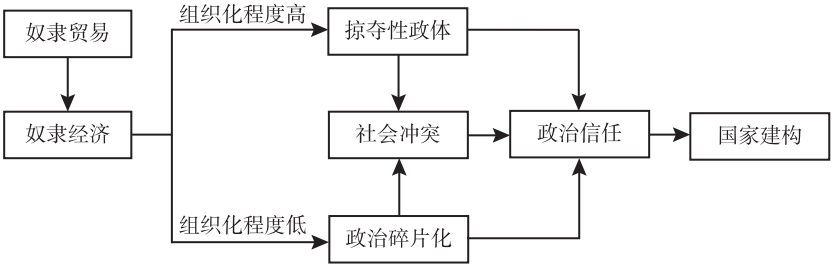

图 2　奴隶贸易、政治信任与国家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奴隶贸易刺激了非洲本土奴隶经济。奴隶贸易的实质是人口的市场化交易，奴隶经济兴起意味着人口的商品化，奴隶数量成为社会财富的象征。② 奴隶贸

① 肖唐镖、赵宏月：《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1—72 页；王正绪：《东亚公民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制度与文化的差异》，载《开放时代》，2016 年第 2 期，第 119—137 页；郑建君：《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 625 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61—74 页。

②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19th Century Human as Merchandise: Slave in Bagamoyo*, Desk Top Productions Limited, 2011;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Bagamoyo 1868-1893: Place of No Hope for Slaves Places Full of Hope for Liberated Slaves*, Desk Top Productions Limited, 201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易规模由市场需求决定。外部体系的劳动力需求使非洲奴隶市场急剧扩大，导致奴隶贸易演变为有利可图的经济产业。奴隶贸易催生了非洲本土的奴隶经济，围绕着人口商品化，掠奴和奴隶贸易逐渐形成“人口商品化—掠奴行动—奴隶贸易”恶性循环的经济生产体系，该生产体系的长期存在对非洲国家建构带来了深远影响。

第二，奴隶经济导致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演变为掠夺性政体。奴隶经济对非洲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带来了不同影响，但这一点在既有文献中未得到重视。非洲族群可根据组织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种类型。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拥有中央权威、管理机构、司法制度和统治阶层，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则不存在类似特征。① 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由于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更易于从奴隶贸易中获利并通过欧洲获得武器，形成“枪支—奴隶”的恶性循环，在进行军事扩张的过程中，奴隶贸易演变为具有自我驱动力的经济行为。② 掠奴和奴隶贸易可获得财富和地位，逐渐成为掠夺性政体的权力和经济支柱（见表 1）。

表 1　1850 年弗里敦地区 179 名奴隶的主要来源方式

序号	成为奴隶的方式	所占比例（%）
1	通过战争	34
2	被绑架	30
3	通过审判程序	11
4	被亲人或长辈出卖	7
5	偿还债务	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制作。有研究者对弗里敦（Freetown）地区（现为塞拉利昂首都）1850 年的 179 名奴隶来源进行了分析，参见 P. E. H. Hair，“The Enslavement of Koelle's Informants，”*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6，No. 2，1965，pp. 193-203。

掠夺性政体建立在奴隶经济的基础上，奴隶可以成为国家的战士和主人，国家又靠获取奴隶和进行奴隶贸易来维持统治。③ 表 1 显示，战争是获得奴隶的最重要途径。研究者对弗里敦地区 179 名奴隶的来源方式进行统计时发现，至少有 1/3 的人口因战争而成为奴隶。随着奴隶贸易规模的扩大，非洲本土的掠夺性政体实现了

① Meyer Fortes and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eds.，*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pp. 1-24.

② Warren C. Whatley，“The Gun-Slave Hypothesis and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Slave Trade，”*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 67，2018，pp. 80-104；John K. Thornton，*Warfare in Atlantic Africa，1500-1800*，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1999，pp. 5-7.

③ Richard Roberts，“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Warrior States：Segu Bambara and Segu Tokolor，c. 1712-1890，”pp. 389-41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再生产。[①] 例如，在作为掠夺性政体的塞古班巴拉统治时期，其领土范围覆盖了尼日尔河流域和塞内加尔的大片区域。其他掠夺性政体还包括达荷美（Dahomey）、桑给巴尔、瑶（Yao）和图库勒（Toucouleur）等王国。[②] 这些掠夺性政体之间因奴隶经济而产生了竞争，竞争激化使它们相互之间的暴力冲突成为常态（如图 3），彼此间的政治信任已丧失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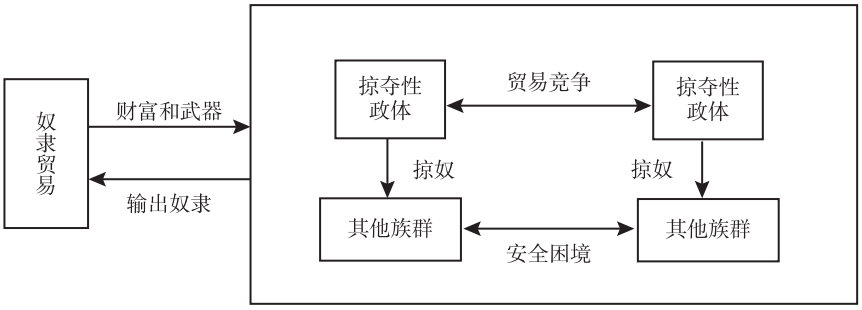

图 3　奴隶贸易对非洲政治秩序的重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在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中（图 3 中的其他族群），奴隶经济导致政治碎片化，使非洲的传统秩序崩溃，也摧毁了民众对政治权威的信任。在奴隶贸易早期，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由于难以组织有效抵抗，被迫沦为掠夺对象。像迪奥拉、巴兰塔（Balanta）和丁卡（Dinka）等人口规模众多但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便成为掠夺性政体的征服对象。[③] 弱小族群在面临安全困境时，为克服安全困境，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加入更强大的族群。这意味着该族群不得不丧失其身份，可能面临被更强大族群压迫和出卖的风险。二是一些小族群联合起来组成新的群体，但这依然很难克服族群成员间彼此的信任问题。如在瓦苏鲁（Wasulu）地区，为应对掠奴，小族群联合组成了贾马纳（Jamana），但贾马纳因有内部成员退出或参与掠奴而分崩离析。[④] 三是变为奴隶贸易的参与者。小族群为了避免

① Richard Robert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Warrior States: Segu Bambara and Segu Tokolor, c. 1712-1890," pp. 389-419.

② J. C. Sharman, "Something New out of Africa: States Made Slaves, Slaves Made States," pp. 497-526.

③ Olga F. Linares, "Deferring to Trade in Slaves: The Jola of Casamance, Senegal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istory in Africa*, Vol. 14, 1987, pp. 113-139; Martin A. Klein, "The Slave Trade and Decentralized Societies,"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2, No. 1, 2001, pp. 49-65; Walter Hawthorne, "The Production of Slaves Where There Was No State: The Guinea-Bissau Region, 1450-1815," *Slavery & Abolition*, Vol. 20, No. 2, 1999, pp. 97-124.

④ Martin A. Klein, "The Slave Trade and Decentralized Societies," p. 5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被俘开始抓捕邻族或族内同胞，将他们贩卖以求自保。此外，族群领袖通过审判、巫术、绑架和债务等多种方式将本族人变为奴隶并进行贩卖，进一步摧毁了族人对其传统领袖的信任。[①] 四是通过迁徙逃避奴隶贸易的压迫，许多人选择迁往其他地区，以求摆脱掠奴行动或奴役的束缚。然而，迁徙也带来了流离失所和族群纽带破裂等社会后果。

第四，奴隶贸易导致传统政治秩序崩溃，削弱了非洲民众的政治信任基础。首先，奴隶贸易虽然因外部市场需求而兴起，但非洲本土精英也深度卷入奴隶贸易的过程并从中获利，成为奴隶贸易的参与者和共谋者，但这种获利建立在牺牲族人政治信任的代价之上。其次，奴隶贸易摧毁了非洲本土的政治信任基础，出现了掠夺性政体暴力掠奴和烧杀抢掠、族人内部的相互伤害以及族内长者为了清除异己或满足私利而出卖本族人等行为。在极端条件下，父母为了还债或生存甚至会出卖自己亲生的孩子，这些行为对政治信任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此外，掠奴者之间也会进行相互捕猎，进行猎物和猎人的角色互换。[②] 欧洲探险者亨利·斯坦利（Henry M. Stanley）对 19 世纪东非奴隶贸易重灾区刚果盆地的描述如下："这个地方饱受食人者、好战部落和掠奴者摧残，人们不得不在各种破坏性的影响中努力维持生命和自由的人性。"[③] 在巴加莫约至今还流传着奴隶女孩西维玛(Siwema)的《奴隶之歌》，歌词中描绘了暴力掠奴的残酷景象："就在我日常劳作、玩耍和歌唱的家园里，蛮人出现并围住我们，他们像捕捉动物一样抓住我们，把我们拴起来，一个连着一个，就像动物一样！"[④]

第五，奴隶贸易导致的低政治信任具有持久性，奴隶贸易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即便经历了殖民统治和国家独立的时代，非洲国家的政治信任重建仍然任重道远。首先，殖民统治进一步破坏了民众政治信任。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本身也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参与者，这些国家在非洲民众眼里是奴隶贸易的始作俑者。欧洲殖民统治以压迫、剥削和攫取为特征，不可能帮助非洲国家重建政治信任。其次，非洲国家虽然经历了独立建国，但在重建政治信任方面的努力乏善可陈。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并未对奴隶贸易的历史进行彻底反思，反而是有选择性地掩盖真相，将奴隶贸易归结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非洲人民的压迫和

① P. E. H. Hair, "The Enslavement of Koelle's Informants,"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6, No. 2, 1965, pp. 193-203.

② Martin A. Klein, "The Slave Trade and Decentralized Societies," p. 49.

③ Henry M. Stanley,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George Newnes Limited, 1875, p. xxii.

④ 原文为英文，歌词由笔者翻译，原文见于巴加莫约天主教博物馆展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剥削，对本土精英的参与避而不谈，[①] 奴隶贸易的部分历史真相也被有意地掩盖。[②] 再次，非洲国家从建国至今并没有带领人民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景，反而陷入政治腐败、发展滞后、族群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境地，执政绩效不足以重建政治信任。最后，奴隶贸易遗留的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继续侵蚀着非洲国家的政治信任。[③] 不管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独立建国时代，奴隶的后代依然从事着更为低下的工作，很难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奴隶的后代与奴隶主后代之间并没有实现和解。当年的奴隶主及其后人一直否认奴隶买卖和蓄奴，不承认对奴隶的剥削行为，甚至对解放后的奴隶依然抱有歧视。获得解放的奴隶及其后代仍然保留着作为奴隶的悲惨记忆，对奴隶贩子和奴隶主存在深深的怨恨。[④]

四、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

混合方法正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⑤] 混合方法既可以是两种分析方法如博弈论与定量分析的结合，也可以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的混合。混合方法试图突破单一方法的局限性，注重不同方法之间的互补。根据研究对象和可用数据特征，本文尝试使用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考察。定量分析重点检验奴隶贸易和民众政治信任的关系，侧重对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并确认其稳健性。在单一定量方法的研究中，数据的可用性往往成为学界推进研究议程的“绊脚石”。本文也曾试图对理论框架中每一段因果过程都进行定量检验，但现有的数据和定量分析技巧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本文对中间过程

① 笔者对来自加纳、马里、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非洲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问题包括：“你的国家如何讲述奴隶贸易史？”“你是否清楚非洲本土奴隶贸易的存在？”以及“你是否了解非洲本土政治精英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等。

② 例如，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的展览仅强调了坦桑尼亚作为殖民地奴隶贸易的受害者情况，但对本土政治精英在奴隶贸易中的参与情况鲜有提及。坦桑尼亚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对奴隶贸易的介绍仅包含大西洋奴隶贸易，并未提及非洲本土奴隶贸易。参见 Tanzani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d., “The Concept of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History for Advanced Secondary Schools: Student's Book (Form Five)*, Tanzani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22, pp. 74-85。

③ Ewout Frankema, Michiel de Haas and Marlous van Waijenburg, “Inequality Regimes in Africa from Pre-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pp. 57-94.

④ 笔者根据实地调研的材料得出此结论。也有研究者在 2000 年对巴加莫约 22 位居民进行了访谈，其中 11 人是奴隶的后代，11 人是奴隶主的后代，参见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19th Century Human as Merchandise: Slave in Bagamoyo*, pp. 43-53。

⑤ 参见唐世平：《迈向混合方法的社会科学研究》，第十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社会科学中的混合研究方法”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 年 7 月 8 日。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展现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来完成。此外，本文的“混合”思维也体现在材料收集方面，对文章论点的支持证据涵盖了大样本数据、问卷调查、档案资料和实地调研等多种数据。①

相较于单独的案例研究而言，混合方法的案例选择依然遵循社会科学案例选择的基本原则，② 但混合方法中的案例考察所发挥的作用与单纯的案例研究存在两点不同：第一，单纯的案例研究仍然需要聚焦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混合方法中的案例部分更侧重于展示定量分析中因数据限制未能涵盖的内容。第二，与单纯的案例研究强调案例选择的合理性不同，混合方法的案例选择将尽量在不同类型的案例以及空间和时间上呈现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文案例分为三种类型，共四个案例（见表 2）。Ⅰ型案例包括塞古班巴拉和奥约，两者均从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演化为非洲王国，并且都因奴隶贸易的影响转变为掠夺性政体。这两个案例阐释了在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中奴隶贸易如何导致非洲掠夺性政体兴起以及对政治信任产生的影响。其中，塞古班巴拉侧重分析奴隶经济如何导致掠夺性政体的兴起，奥约则重点阐述掠夺性政体对政治信任的破坏性作用。Ⅱ型案例为迪奥拉。迪奥拉始终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族群，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该案例解释了奴隶贸易对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削弱传统政治权威进而摧毁政治信任的原因。Ⅲ型案例是桑给巴尔，在案例中将主要作为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呈现。桑给巴尔位于东非地区，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了奴隶贸易，随后也深度参与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后，桑给巴尔当地的奴隶贸易仍得以持续。奴隶贸易对桑给巴尔当代社会的政治信任带来了持续性负面影响，该案例展示了本文理论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解释力。

---

① 笔者的实地调研点包括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档案资料主要为笔者在调研时获取的奴隶贸易史资料，参见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19th Century Human as Merchandise: Slave in Bagamoyo*, 2011;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Bagamoyo 1868-1893: Place of No Hope for Slaves Places Full of Hope for Liberated Slaves*, 2011;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1868-1893 Bagamoyo Catholic Mission: What Old Stretches and Documents Tell*, Desk Top Productions Limited, 2011; Fr. Johannes Henschel, ed., *Documents Tell About Slavery from 1900-1915: How Much Africans Involved*? Department for Antiquities, Catholic Museum, 2002。

② 参见叶成城等：《社会科学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 年第 3 期，第 145—155 页；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10 期，第 22—47 页；游宇、陈超：《一切为了理论——理论化与整合性的案例选择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 年第 12 期，第 144—167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 2　案例选择和说明

类型	案例选择说明	具体案例	简要说明
Ⅰ	在组织化程度高的族群中，奴隶贸易如何导致掠夺性政体，摧毁政治信任	塞古班巴拉	侧重掠夺性政体的兴起
		奥约	侧重掠夺性政体的破坏性
Ⅱ	奴隶贸易如何在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中导致政治碎片，削弱政治信任	迪奥拉	组织化程度低的族群如何应对奴隶贸易
Ⅲ	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的负面作用具有持久性，对核心理论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维度的解释力进行说明	桑给巴尔	奴隶贸易影响空间广阔性和时间持久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的定量分析旨在检验奴隶贸易对民众政治信任的直接影响，同时也讨论了中间的可能路径。本节首先介绍了核心变量的测量方案、数据来源和匹配方法，其次对模型设定进行了说明，最后汇报了定量分析的研究发现。族群是奴隶贸易时期非洲社会的基本单位，定量分析因此将族群层面的受访者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相较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分析，族群层面的研究能够揭示奴隶贸易对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影响。本文在理论框架中强调了奴隶贸易在不同族群间产生的差异性反应及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此外，有关非洲族群的数据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这也为本文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更为精准的信息。

（一）数据来源和匹配

1. 政治信任

本文使用“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至第六轮的问卷数据测量民众政治信任，该数据调研了受访者对本国不同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情况。① 之所以选择第二轮至第六轮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每一轮调查所覆盖的非洲国家数量不一致，如第一轮仅覆盖了 12 个国家，第六轮则覆盖了 36 个国家，不同轮次数据合并使用有助于获得更完整样本；② 二是不同轮次的调研时间有先后，如第一轮的时间追溯到 2002 年，第六轮的时间则追溯至 2015 年，这为检验奴隶贸易和政治信

① 由于第一轮的调查问卷中不包含政治信任问题，因此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

② 第二轮至第六轮调查覆盖国家数量分别为 16 个、18 个、20 个、34 个和 36 个。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任关系的持久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方案。

在“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中，对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测量包括他们对总体政治信任以及对各类政府机构的政治信任。总体政治信任用以测量民众对本国政府机构的综合信任度。不同政府机构的政治信任包括国家行政机构（总统）、国家代议机构（议会）、国家司法审判机构（法院）和国家暴力机构（警察）。[①] 受访者针对上述不同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回答，答案选项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仅有一点信任”“部分信任”“非常信任”和“不清楚”。[②] 本文将受访者的前四个选项分别编码为 0—3，“不清楚”则编码为缺失值。其中，总体政治信任为受访者对总统、议会、法院和警察的信任初始编码的加总。

2. 奴隶贸易

本文使用族群奴隶贸易强度测量非洲本土社会参与奴隶贸易的程度。族群奴隶贸易强度为每一个族群单位内奴隶输出人数和族群领地面积的比值，来源于萨拉·洛斯（Sara Lowes）和纳恩收集的非洲奴隶贸易数据。[③] 族群奴隶贸易强度数据涵盖跨撒哈拉、红海、印度洋和大西洋奴隶贸易。民族志地图（Ethnographic Atlas）数据则提供了非洲族群的历史边界。[④] 此外，本文还使用族群奴隶输出规模（每万人和自然对数）作为族群奴隶贸易强度的替代测量。

非洲奴隶贸易涉及的空间范围广且族群数量多。在民族志地图包含的非洲 824 个族群中，族群奴隶贸易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如图 4）。有 25 个族群的奴隶输出规模超过 10 万人，其中刚果族（Kongo）输出奴隶规模最大，超过了 383 万人，冯族（Fon）也达到了 85 万人，贝尔塔族（Berta）和约鲁巴族（Yoruba）均超过 66 万人。如果从奴隶贸易强度（每平方公里输出奴隶数量）的角度来看，这些族群的奴隶输出强度均超过 3.48。

3. 数据匹配

“非洲晴雨表”数据提供了受访者地理位置信息，而空间化的民族志地图则提

---

① 部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并非总统而是总理。在立法机构中，有的国家是议会（National Parliament），而有的国家是国会（National Assembly）。

② 参见“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至第六轮调查编码表，“Merged Data，”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data/merged-data/。

③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2024，DOI：10.1098/rstb.2023.0032.

④ 原始数据参见 George Peter Murdock，*Ethnographic Atla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7；整合完善后的数据参见 Patrick Gray，“A Corrected Ethnographic Atlas，” *World Cultures*，Vol.10，No.1，1999，pp.24-81；族群边界地理信息数据参见“Data，” https：//nathannunn.arts.ubc.ca/data/。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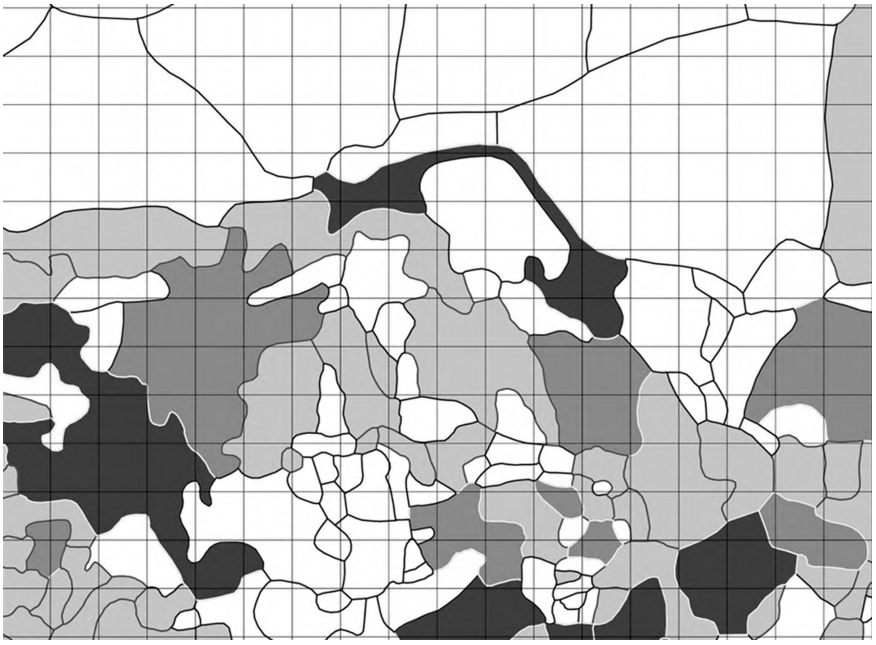

图 4　族群奴隶输出规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2024，DOI：10.1098/rstb.2023.0032。

注：单位为万人，颜色越深表示奴隶输出数量越多，网格为经纬度示意。

供了清晰的族群边界。本文使用“量化地理信息系统（QGIS）”软件将受访者地理位置和族群地理区位进行了空间匹配，从而构建出分析样本。在样本中，每一名受访者皆从属某个特定族群，受访者数据不仅包含了政治信任信息，还纳入了受访者所在族群的奴隶输出强度信息（如图 5）。由于“非洲晴雨表”数据并未覆盖所有非洲国家，尽管部分族群有奴隶输出，但缺乏受访者的政治信任数据。

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族群的奴隶贸易强度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一致性关联。本文分别以奴隶贸易强度的均值为分界线构建出不同的对照样本，将奴隶贸易强度大于或等于均值的样本编码为一组，奴隶贸易强度小于均值的样本编码为另一组，计算两组样本的政治信任差值（前者减去后者）。无论是总体政治信任还是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奴隶贸易强度高的受访者，其政治信任度都低于奴隶贸易强度低的受访者（见表 3）。当然，奴隶贸易强度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还需进一步分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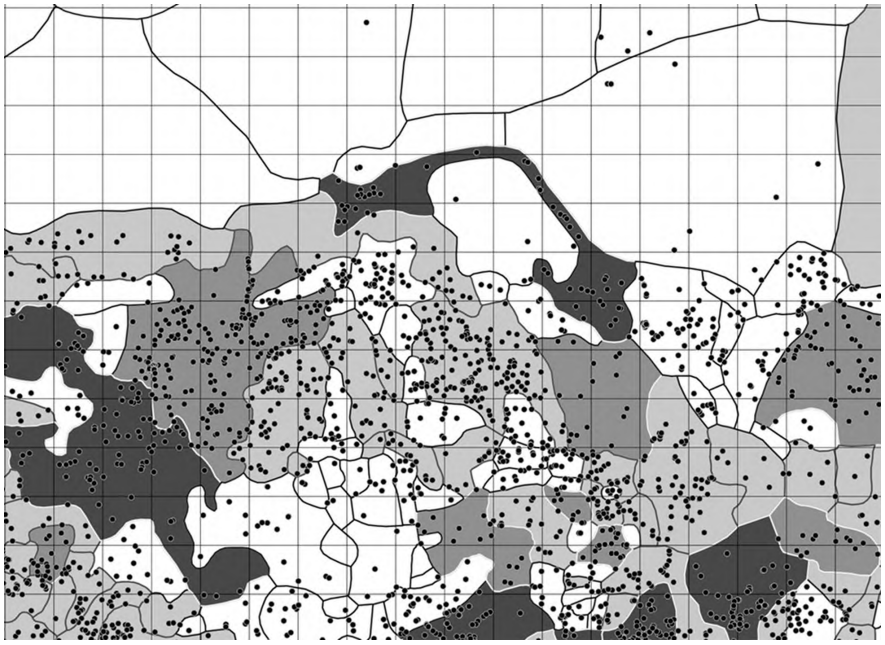

图 5 受访者与族群的空间匹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2024，DOI：10.1098/rstb.2023.0032。

注：黑点为受访者地理位置，网格为经纬度示意。

表 3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

政治信任	奴隶贸易强度高	奴隶贸易强度低	差值
总体信任	6.490	6.895	-0.522
总统	1.761	1.920	-0.209
议会	1.544	1.689	-0.175
法院	1.663	1.750	-0.112
警察	1.546	1.560	-0.03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4. 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了“非洲晴雨表”中受访者个体层面和族群层面的数据，并依次对个体、族群和国家层面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在个体层面，模型中控制了受访者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城乡特征。[①] 这些个体特征可能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形成干扰。在族群层面，模型对族群组织化程度、领地面积、海岸线距离和族群地理中心的经纬度进行了控制。[②] 族群政治组织化程度具有异质性，领地面积可能影响掠奴的难度，族群和海岸线的距离影响了奴隶贸易的参与程度，族群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奴隶贸易的重要考虑因素。[③] 在国家层面，模型控制了受访者所在国殖民统治历史、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体类型、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治稳定性等潜在干扰变量。[④] 在样本中，殖民统治时长为 53—480 年，由于奴隶贸易和当下民众政治信任存在较长的时间差，控制殖民统治历史时长有助于检验奴隶贸易影响的持久性。政体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绩效、国家治理和社会动荡情况可能会对非洲民众的当下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对其进行控制也具有必要性。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4。

表 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体政治信任	151638	6.644	3.417	0	12.000
对总统的信任	164339	1.800	1.113	0	3.000
对议会的信任	158515	1.592	1.065	0	3.000
对法院的信任	162062	1.729	1.042	0	3.000
对警察的信任	166433	1.546	1.100	0	3.000
奴隶贸易强度	157563	0.620	1.183	0	3.487
奴隶贸易规模（万人）	157563	5.652	15.330	0	85.500

① “不清楚”等其他选项编码为缺失值，参见“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至第六轮调查编码表，“Merged Data,”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data/merged-data/。

② 参见 Patrick Gray, “A Corrected Ethnographic Atlas,” pp. 24-81;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24, DOI: 10.1098/rstb.2023.0032。

③ 数据来源于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24, DOI: 10.1098/rstb.2023.0032。

④ 有关政体类型数据来源，参见“Polity 5 Annual Time-Series, 1946-2018,”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殖民时长是指从殖民到独立的总年数（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和佛得角三国的殖民时长由笔者单独整理），参见 Patrick Ziltener and Daniel Kunzler, “Impacts of Colonialism: A Research Survey,”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9, No. 2, 2013, pp. 290-311；人口规模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指数（WDI），参见“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治稳定性来自全球治理指数（WGI），参见“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续表 4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奴隶贸易规模（对数）	157563	4.725	4.934	0	13.660
年龄	169339	35.740	14.140	18.000	130.000
城乡	170654	0.607	0.488	0	1.000
性别	170654	0.501	0.500	0	1.000
教育水平	170224	3.263	2.096	0	9.000
政治组织化程度	116364	2.826	1.049	1.000	5.000
领地面积（对数）	157563	10.370	1.110	5.460	13.050
海岸线距离（对数）	157563	5.613	1.102	1.218	7.348
经度	157563	18.640	16.500	-16.410	41.750
纬度	157563	-3.164	16.730	-33.090	36.580
殖民统治历史	170654	178.600	128.400	53.000	480.000
人口规模（对数）	170654	16.540	1.334	13.070	19.030
人均 GDP（对数）	170654	7.107	0.951	5.473	9.246
政体类型	155129	5.151	4.148	-9.000	10.000
国家治理能力	170654	-0.477	0.522	-1.546	1.044
政治稳定性	170654	-0.399	0.800	-2.130	1.20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城市赋值为 0，农村赋值为 1；男性赋值为 0，女性赋值为 1；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奴隶输出规模（对数）和海岸线距离（对数）的计算方法为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二）定量分析与检验

1. 主要发现及稳健性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为主分析模型。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个体控制）、族群层面的控制变量（族群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国家控制）三组，依次加入模型。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城乡、性别和受教育水平；族群控制变量为受访者所在族群的政治组织化程度、领地面积、海岸线距离和经纬度；国家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所在国的殖民统治历史、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体类型、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治稳定性。模型中同时对受访者的受访时间（年份）和所在国家进行了固定效应处理。

表 5 展示了族群奴隶贸易强度对受访者政治信任影响的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现，奴隶贸易强度和受访者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族群奴隶贸易强度越高的族群，其受访者的政治信任越低。无论是总体政治信任还是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都达到了1%的统计显著性（见表5模型1—模型5）。这表明族群奴隶贸易强度对民众政治信任具有全面性影响，不仅降低了民众对政治权威的总体政治信任，还对主要行政机构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5　奴隶贸易强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总体政治信任	对国家不同机构的政治信任			
		总统	议会	法院	警察
奴隶贸易强度	-0.060*** (0.011)	-0.015*** (0.004)	-0.015*** (0.004)	-0.021*** (0.004)	-0.024*** (0.004)
个体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族群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88881	95623	92560	94526	96732
R^2	0.184	0.123	0.124	0.117	0.16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因此对其分析过程略去。*** p<0.01，** p<0.05，* p<0.1。

族群奴隶贸易强度对受访者政治信任具有实质性影响。虽然受访者对不同政治机构信任程度的系数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方向性的，只是在具体数值上体现了不同。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对特定机构的政治信任进行区分，因此对边际效应的解读主要围绕总体政治信任展开。从直观的角度来看，族群奴隶贸易强度越高，族群所在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越低（如图6）。从具体的角度来看，奴隶贸易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民众政治信任就降低6%（见表5模型1）。

针对奴隶贸易强度和总体政治信任的回归结果，本文进行了五种稳健性检验（见表6）。第一种和第二种稳健性检验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族群奴隶贸易强度测量方案，研究结果皆为显著负相关（见表6模型1和模型2）。第三种稳健性检验使用定序逻辑斯蒂回归（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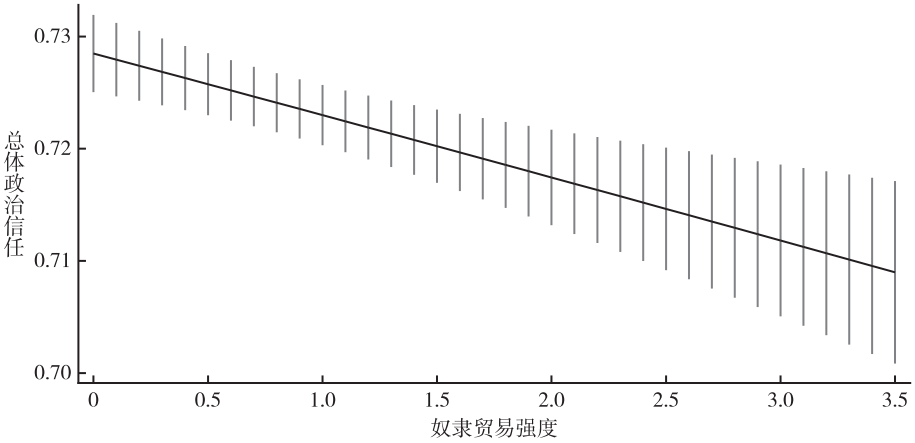

图 6　奴隶贸易强度对总体政治信任影响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变量设定与表 5 模型 1 一致。为了更直观展示研究结果，本文使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将“完全不信任”和“仅有一点信任”编码为 0，表示低政治信任；将“部分信任”和“非常信任”编码为 1，表示高政治信任，取 90%置信区间。

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结果并无二致（见表 6 模型 3）。第四种稳健性检验考虑了并不是所有非洲族群都参与了奴隶贸易（如马赛族就成功抵制了奴隶贸易）的情况，仅将参与奴隶贸易的族群纳入模型检验。研究表明，在参与奴隶贸易的族群中，强度高的族群依然保持着更低的政治信任水平（见表 6 模型 4）。第五种稳健性检验将受访者地理位置的精准度设定为误差范围 25 千米内，分析结果也和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结果一致（见表 6 模型 5）。

表 6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替换因变量Ⅰ	替换因变量Ⅱ	定序逻辑斯蒂模型	参与者样本	地理位置精准度
奴隶贸易规模（万人）	-0.011*** (0.001)	—	—	—	—
奴隶贸易规模（对数）	—	-0.011*** (0.003)	—	—	—
奴隶贸易强度	—	—	-0.037*** (0.007)	-0.094*** (0.014)	-0.107*** (0.01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续表 6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替换因变量Ⅰ	替换因变量Ⅱ	定序逻辑斯蒂模型	参与者样本	地理位置精准度
个体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族群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8881	88881	88881	54227	49279
R^2/*Pseudo* R^2	0.185	0.184	0.040	0.214	0.20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无此项，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故对其略去分析。定序逻辑斯回归蒂模型取 *Pseudo* R^2。*** p<0.01，** p<0.05，* p<0.1。

2. 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持久性

本文基于现有数据对奴隶贸易影响的持久性进行了简要检验。根据第二轮至第六轮“非洲晴雨表”的调查时间，如果奴隶贸易强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不同轮次的样本中表现出不一致或不显著，那么就从侧面说明了奴隶贸易的影响并不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奴隶贸易强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不同轮次的样本中表现一致或显著，则说明奴隶贸易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因此，本文将不同轮次的受访者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做了对比。结果表明，在不同轮次的受访者样本中，奴隶贸易强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回归系数始终为负且至少达到了 10%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如图 7）。换言之，奴隶贸易对非洲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或消失。

3. 奴隶贸易的“冲突效应”

在理论探讨部分，本文揭示了奴隶贸易如何催生非洲奴隶经济进而通过掠夺性政体和政治碎片化等方式加剧暴力冲突并最终削弱政治信任的内在机理。为验证这一逻辑链条，本文通过逐步检验法对其进行分析。

第一步主要是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族群奴隶贸易强度与暴力冲突规模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了两类非洲暴力冲突数据：第一类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从 1400 年至 1700 年，第二类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从 1997 年至 2020 年。这两类数据都提供了暴力发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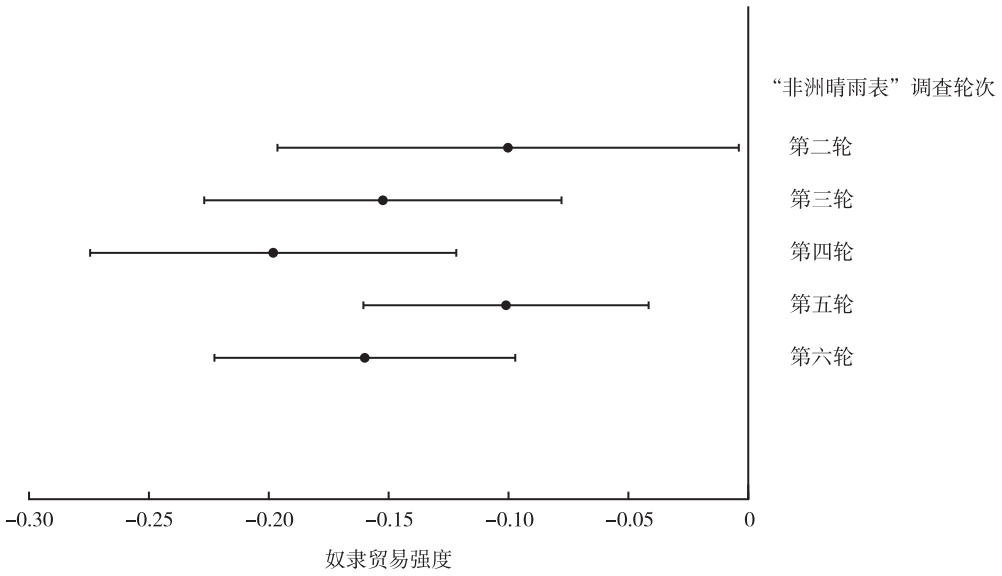

图 7　奴隶贸易强度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持久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横坐标为奴隶贸易对总体政治信任影响的回归系数，纵坐标为“非洲晴雨表”调查的不同轮次分析结果。模型设定中使用的是奴隶贸易参与者样本且受访者位置的精准度小于等于 2，取 90%置信区间。

生的地理位置和伤亡人数，通过将其与族群领地相匹配，构建了族群层面的暴力冲突分析样本。① 通过控制族群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族群奴隶贸易强度与暴力冲突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奴隶贸易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冲突（见表 7 模型 1），不仅引发了更多的历史暴力冲突（见表 7 模型 2），还导致更多的当代暴力冲突（见表 7 模型 3）。② 由此可见，尽管影响的显著性有所减弱（从 1%的显著性水平下降至 10%的显著性水平），奴隶贸易引发的“冲突效应”仍具有时间持久性。

① 为统计方便，本文仅保留死亡人数在 25 人以上的冲突。相关的历史冲突数据参见 James Fenske and Namrata Kala，“1807：Economic Shocks，Conflict and the Slave Trad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 126，2017，pp. 66-76。当代冲突数据来自武装冲突位置与事件数据，参见“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https：//acleddata. com/。

② 学界也存在类似的研究发现，参见 Zhang Yu，Xu Zhicheng and Shahriar Kibriya，“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Slave Trade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pp. 776-80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 7　奴隶贸易的“冲突效应”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暴力冲突规模	历史暴力冲突	当代暴力冲突	总体政治信任
		1400—1700 年	1997—2020 年	均值
奴隶贸易强度	3.034** (1.404)	0.525*** (0.190)	2.509* (1.397)	—
暴力冲突	—	—	—	-0.0012** (0.0006)
族群控制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20	420	420	282
R^2	0.093	0.208	0.086	0.19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示无此项，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故对其分析略去。总体政治信任取二分变量，以族群为单位取均值。*** p<0.01，** p<0.05，* p<0.1。

第二步主要是探究暴力冲突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分析暴力冲突是否会降低政治信任水平。本文以族群为单位计算政治信任的均值，并将其与族群层面的暴力冲突数据相匹配，形成分析样本。尽管均值处理可能降低了变量信息的准确度和丰富性，但研究结果仍表明，暴力冲突会显著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这与既有研究一致（见表 7 模型 4）。这一发现表明，奴隶贸易确实可能通过“冲突效应”削弱了当代民众的政治信任。

4. 奴隶贸易的“空间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效应”是笔者借用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关于国家形式演化理论而提出的概念。奥尔森认为，相较于四处流动的统治团体，固定的统治团体因追求长期利益而对国家发展更为有利。① 相较奥尔森所指的内容，本文更强调固定的统治团体带来的负面影响。空间固定效应在本文是指基于奴隶经济的掠夺性政体对当地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对政治信任的侵蚀），且这种效应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具有长期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对于历史上奴隶贸易更为严重的地区而言，其传统社会所拥有的政治体系和治理体系更容易崩溃，民众留下的历史伤疤和集体记忆难以修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难以重塑。

非洲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广人稀，人口因此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源，这也

① 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1993, pp. 567-57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是奴隶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非洲族群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统治边界，相较于现代国家，非洲地区的一些统治者对领土控制能力有限，人口迁移成为民众应对外部变化（如战乱、逃避掠奴或自然灾害）的一种生存策略。[①] 人口迁移现象的长期存在也为甄别奴隶贸易的空间固定效应提供了可能方案。为了抵御掠奴行为的发生，一些族群建立了由土墙或荆棘打造的防御措施，而另外一些族群无法抵御掠奴行为的侵扰，只好选择客走他乡。[②] 如在巴兰塔所在地区，弱小族群为了逃避掠奴只好迁移到更大的族群居住区以寻求庇护。[③] 昌巴族人（Chamba）和卡布雷族人（Kabre）为了抵御外来掠奴行为，不得不从平原迁徙到山区。[④] 这些史实表明，在掠奴行为严重的族群地区，相较于迁出的族群成员，留守的族群成员更易遭受奴隶贸易的影响。

结合非洲社会特征，同时受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相关讨论的启发，本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族群内部“留守者—迁出者”在政治信任上的差异对比来检验空间固定效应。[⑤] 在奴隶贸易的背景下，同一族群的成员可以选择成为留守者或迁出者。其中，留守者是指在遭受掠奴时仍选择留在原地的族人，而迁出者则是指选择离开并迁移至其他地区的族人。通过对比同一族群的留守者与迁出者在政治信任上的差异可以检验空间固定效应是否存在。此外，由于两组样本属于同一族群，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将有利于缓解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

遵循这一思路，本文以奴隶输出规模大于 10 万人的 25 个非洲族群受访者构建分析样本（如图 8）。根据民族志地图和受访者的国别信息分辨其是否迁出族群领地。如果受访者位置和该族群所在国一致，则编码为留守者。如果受访者位置与该族群所在国不一致，则编码为迁出者。例如，伊博族人（Ibo）所属领地为尼日利亚，当受访者族群身份为伊博族且地理位置处于尼日利亚境内时，则编入留守者样本。反之，如果受访者族群身份为伊博族人，但受访时的地理位置处于尼日利亚境

① Jeffrey Herbst, *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 2000.

② Martin A. Klein, “The Slave Trade and Decentralized Societies,” p. 55.

③ Lisa A. Lindsay, “Extraversion, Creolization, and Dependency 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5, No. 2, 2014, p. 140.

④ Martin A. Klein, “The Slave Trade and Decentralized Societies,” p. 55.

⑤ 参见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1978, pp. 90-107；阿尔伯特·O. 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格致出版社 2015 年版。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外，则编码为迁出者样本。[①] 在分析样本中，迁出者样本占比为 25.63%，留守者样本占比为 7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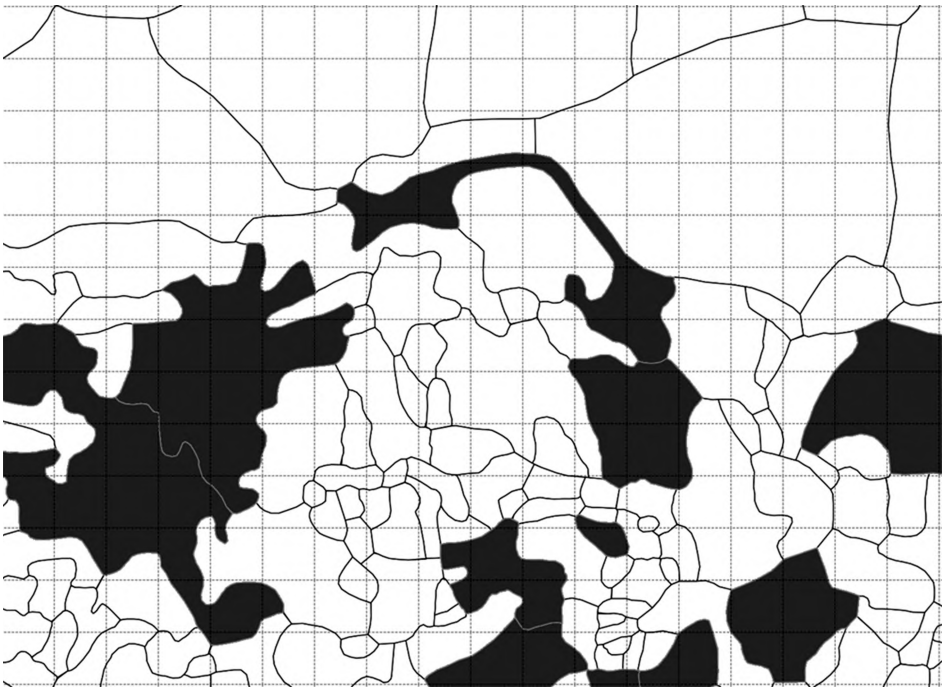

图 8　奴隶输出规模大于 10 万人的族群分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2024，DOI：10.1098/rstb.2023.0032。

注：黑色区域为奴隶输出大于 10 万人的族群，网络为经纬度示意。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回归分析显示，在 25 个奴隶贸易强度较高的族群中，留守者的政治信任要显著低于迁出者（见表 8），这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奴隶贸易的空间固定效应。无论是总体政治信任还是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留守者的政治信任系数都达到了 1%的负向显著性水平（见表 8 模型 1 至模型 5）。这表明，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持久性，对于那些奴隶贸易严重的族群地区，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族人则持有更低的政治信任。

① 有的族群为跨境族群，如桑海族跨越了马里和尼日尔，本文在分析中把既不在马里也不在尼日尔的桑海族编码为迁出者，其他的族群以此类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 8 奴隶贸易的空间固定效应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总体政治信任	对不同国家机构的政治信任			
		总统	议会	法院	警察
留守者	-0.972*** (0.115)	-0.253*** (0.037)	-0.209*** (0.037)	-0.352*** (0.037)	-0.162*** (0.036)
个体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族群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502	15333	14974	15141	15342
R^2	0.267	0.191	0.184	0.150	0.25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因此对其分析过程略去。*** p<0.01，** p<0.05，* p<0.1。

六、案例考察：奴隶贸易如何成为国家建构的枷锁

本文选取四个案例进行考察，重点分析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影响的中间过程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这些案例的内容主要来源于相关史料，辅以实地调研获取的证据。为确保资料的可靠性，笔者先后对东非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进行了短期实地调研。调研内容涵盖当地奴隶贸易市场遗址、奴隶贸易港口和奴隶贸易历史博物馆，同时通过访谈部分民众、搜集档案资料等方式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研究内容。①

（一）塞古班巴拉：奴隶贸易与掠夺性政体的兴起

塞古班巴拉是一个存在于 1712—1861 年的非洲王国，由马马里·库鲁巴利（Mamari Kulubali）带领其族人建立，领土位于现今的马里境内。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之前，塞古班巴拉已具备一定的政治组织结构。在成为掠夺性政体之前，塞古班巴拉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商路的畅通。库鲁巴利的祖辈并未建立以掠夺奴隶为生的军队，

① 笔者于 2024 年 5 月和 7 月分别在桑给巴尔和巴加莫约进行了调研，考察的重点内容是奴隶贸易市场以及奴隶贸易的后续影响。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当地农民则通过生产谷物和可乐果等产品与外界交换食盐。[①] 虽然当时存在零星的掠奴行为，但规模有限，对奴隶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补充家庭劳动力和从事家务。也就是说，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之前，塞古班巴拉并不是一个掠夺性政体。

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后，当地的奴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塞古班巴拉迅速崛起为一个以掠奴为主业的掠夺性政体。奴隶贸易刺激了当地的奴隶经济，导致掠奴阶层迅速崛起。塞古班巴拉的兴衰与大西洋奴隶贸易时间基本保持了一致。[②] 此前，奴隶是战争的副产品（俘虏），士兵和农民间并未分化。当库鲁巴利意识到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利可图时，他便建立了从属于国王的掠奴军队——同（ton）。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和战士忠诚，库鲁巴利开始在军队中启用奴隶，并成立了以奴隶为主的军队法玛（jaama）。法玛的首领由奴隶担任并对国王效忠，这些士兵也被称为“奴隶战士”。

塞古班巴拉的奴隶战士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生产工具（武器和火药）和生存物资（食物和战利品）。[③] 由此一来，奴隶战士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单独的利益团体。不断发动战争是这些奴隶战士的生存之道，奴隶战士凭借其掠奴能力获得晋升和提拔；如果在战争中失败，他们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阶层地位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奴隶战士阶层便成为掠夺性政体的忠实捍卫者。换言之，建立在奴隶经济上的掠夺性政体获得了自我强化、存续和再生产的动力机制。

塞古班巴拉的统治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战争和动荡不仅摧毁了政治信任的社会环境，还使各方之间的政治信任日益恶化。为了得到奴隶和战利品，塞古班巴拉不断侵扰周边族群，其军事行动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军事行动被称为克勒（Kele），是塞古班巴拉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目标是获得大规模的奴隶和其他战利品。第二种军事行动被称为索博利（Soboli），大致由 40 人左右的骑兵组成，索博利可在任何时候进行。[④] 第三种军事行动被称为贾多（Jado），一般由 10—20 名奴隶战士组成，是一种非正式的军事行动。在克勒和索博利军事行动中获得的战利品，按照 30%—60%的比例分配给参与行动的奴隶战士。[⑤] 除获得职位晋升外，战利品

① Richard Roberts, *Warriors, Merchants, and Slaves: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00-1914*, p. 15.

② 参见 Philip D. Curt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③ Richard Roberts, *Warriors, Merchants, and Slaves: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00-1914*, p. 18.

④ Richard Roberts, *Warriors, Merchants, and Slaves: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00-1914*, pp. 36-37.

⑤ Richard Roberts, *Warriors, Merchants, and Slaves: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the Middle Niger Valley, 1700-1914*, pp. 38-3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分配也成为激励塞古班巴拉士兵的战争动力，奴隶战士为了抢夺战利品而相互争斗。

（二）奥约：掠夺性政体如何摧毁政治信任

奥约也是一个非洲王国，它的存续时间大致为 1300—1896 年，统治区域位于现今尼日利亚的东南部。奥约源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在奴隶经济的刺激下，逐渐演变为以掠奴为核心的掠夺性政体。18 世纪，奥约在继续充当南部约鲁巴人和北部豪萨人贸易中间商的同时，还在当地开辟了奴隶种植园，并积极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奥约一度使阿拉达（Allada）王国和达荷美王国臣服。①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过程中，奥约贩卖了超过 66 万的约鲁巴人。② 据估算，仅在 1825 年就有多达 12425 名奴隶通过小波波（Little Popo）和拉各斯（Lagos）之间的海岸运出。③ 奥约对政治信任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奴隶贸易打破了传统政治信任框架。在奥约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国王与由贵族组成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uncil）共享权力，皇家委员会拥有选任新国王的权力并握有军权。④ 随着奴隶贸易和军事扩张，由于分赃不均，国王和皇家委员会间的矛盾日益显露。仅在 1690—1754 年，9 位国王中就有 6 位被迫自杀。⑤ 为了扩大权力，国王开始吸纳奴隶进入统治阶层，如在首都使用奴隶担任政府官员，在新征服的统治区内任命奴隶为地方官员。这些奴隶官员和管理人员只效忠于国王个人。另外，奴隶官员负责在王国统治区内收税，奴隶担任王族的安保工作，奴隶军官被赋予统领地区军队的职责。皇家委员会为了限制国王权力，多次使用贵族及其近亲取代奴隶官员，这样便与国王产生了深刻的矛盾。⑥

第二，奴隶贸易引发了王权、奴隶和贵族间的政治冲突，进一步削弱了政治信任。1816—1836 年，发生在首都的战争不下 9 次。⑦ 1817 年，奥约地区发生了奴隶起义，其境内伊洛林省（Ilorin）的军队长官为争夺王位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迅速

---

① J. C. Sharman, "Something New out of Africa: States Made Slaves, Slaves Made States," pp. 497-526.

② Sara Lowes and Nathan Nunn,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atrilineal Kinship,"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024, DOI: 10.1098/rstb.2023.0032.

③ 小波波是殖民时期对现今多哥的称呼，数据来源参见 Henry B. Lovejoy, "Mapping Uncertainty: The Collapse of Oyo and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816-1836," *Journal of Global Slavery*, Vol. 4, No. 2, 2019, p. 149。

④ Sean Stilwell, *Slavery and Slaving in African History*, pp. 115-116.

⑤ Sean Stilwell, *Slavery and Slaving in African History*, p. 117.

⑥ Sean Stilwell, *Slavery and Slaving in African History*, p. 118.

⑦ Henry B. Lovejoy, "Mapping Uncertainty: The Collapse of Oyo and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816-1836," pp. 127-16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扩散到奥约的其他统治区，严重威胁奥约的统治秩序，削弱了奥约的领土控制能力和政治权威。与此同时，受伊洛林叛乱的影响，北方的豪萨人和弗拉尼地区的奴隶也发动了起义，紧接着首都地区的穆斯林也发动了叛乱。[①]

第三，由奴隶贸易竞争激化的区域战争摧毁了政治信任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周边势力为了控制奴隶贸易经常与奥约开战，如达荷美王国为了控制奴隶贸易海港而攻击奥约的奴隶商队，绑架奥约国民。在长期内忧外患的折磨下，奥约于1835年爆发内战，政治格局迅速恶化。内战不仅加剧了王国内部的分裂，也使得原本强大的中央政权逐渐丧失控制力，最终导致奥约解体为多个小规模的政治实体。这一解体过程标志着奥约的衰落，也反映出在外部压力与内部冲突交织的情况下，奥约的传统政治结构如何迅速崩塌。

（三）迪奥拉：出卖族人的酋长

迪奥拉又称朱拉（Jola），是一个规模较大但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洲族群，其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0世纪，主要分布在现今西非的卡萨芒斯（Casamance）地区。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塞古班巴拉和奥约相比，奴隶贸易对迪奥拉人的政治信任同样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其作用方式截然不同。历史上，曾有大量迪奥拉人被贩卖为奴隶并流散至其他地区。独立后，迪奥拉人聚居的卡萨芒斯地区依然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的重灾区。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起，该地区爆发了持续至今的分离运动。卡萨芒斯地区冲突频发，不仅发生在不同军事组织之间，也发生在军事组织与政府军之间，导致政治信任难以建立，和平进程屡次受阻。这种政治困境正是政治信任缺失的体现，在根本上源于奴隶贸易对该地区带来的历史性影响。

起初，迪奥拉人是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迪奥拉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虽然当地存在不同族群，但这些族群并未产生有效的政治组织。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前，迪奥拉的偷牛者被抓住后往往需要缴纳赎金，否则就会沦为奴隶，但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自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后，缺乏组织化抵抗能力的迪奥拉人便成为周边掠夺性政体的掠奴对象。迪奥拉经常遭到拥有更强武装的拜努克人（Bainounk）和迪奥拉北岸人的袭击，每年有7000名奴隶从迪奥拉输出。[②] 后来，迪奥拉从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变成了奴隶贸易的参与者。面对强大族群的侵扰，迪奥拉内部的不同群体也被卷入奴隶贸易。如迪奥拉内部的埃苏拉鲁人（Esulalu）经常会遭到相邻族群朱古特人

① Robin Law, *The Oyo Empire c. 1600 – c. 1836: A West African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Gregg Revivals, 1991, pp. 246-247.

② Robert Martin Baum, *Shrines of the Slave Trade: Diola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Senegamb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Djougoutes) 和胡卢夫人 (Huluf) 的侵袭。后来，埃苏拉鲁人也开始参与掠奴行动。掠奴者通过伏击、使用弓箭征服等方式抓获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将他们扣上木制的枷锁并用独木舟运到奴隶市场进行贩卖。

奴隶经济导致迪奥拉内部出现了经济和社会分化。在参与奴隶贸易前，迪奥拉人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水稻种植。奴隶贸易使掠奴成为比种植水稻更加有利可图的买卖，掠奴和参与奴隶贸易也演变为掠奴者发家致富的捷径，他们通过贸易奴隶购买了更多牛羊、枪支、铜制品和衣物。① 迪奥拉人的社会地位一般由其拥有的牛的数量决定，当参与奴隶贸易的族人能够获得更多牛并在族中获得权势时，这就会刺激更多迪奥拉人逐渐从农业生产转向奴隶贸易，掠奴几乎变成迪奥拉人的全民行动，传统的水稻生产经济被奴隶经济取代。

迪奥拉参与奴隶贸易导致的后果是，当地社会出现了政治碎片化并摧毁了族人对政治权威的信任以及族人彼此间的政治信任。迪奥拉的族群领袖、长者和宗教人士大多深度参与奴隶贸易过程并从中获益。例如，在面临奴隶贸易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为获得更多奴隶，迪奥拉人开始通过公开的法庭裁决和秘密绑架儿童等方式将族人变为奴隶。② 族群政治精英从内部掠夺奴隶的做法摧毁了族人对传统政治权威的信任。此外，奴隶贸易还产生了新的政治文化，统治者将奴隶贩子作为普通族人和神沟通的媒介，有利于他们对族群成员进行精神和政治控制。③

迪奥拉从奴隶贸易的受害者转变成奴隶贸易的参与者，这个过程生动展现了奴隶贸易的兴起为何会对当地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族群产生意外性负面影响。这些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族群从抵制和逃避奴隶贸易逐渐转变为加入奴隶贸易。最终，将族人变为奴隶不仅是经济掠夺的手段，也成为统治者（酋长）排斥异己、巩固权力的工具。这种做法加剧了族群的内部分裂，破坏了传统的宗族关系，导致政治秩序和权威的丧失。④ 更有甚者，族群中的一些长辈甚至将自己年幼的子女作为典当或商品，用以换取食物和安全，进而摧毁了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纽带，而亲缘关系正是传统

① Robert Martin Baum, *Shrines of the Slave Trade: Diola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Senegambia*, pp. 124-126.

② Robert Martin Baum, *Shrines of the Slave Trade: Diola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Senegambia*, pp. 112-125.

③ Robert Martin Baum, *Shrines of the Slave Trade: Diola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Senegambia*, pp. 126-128.

④ Walter Hawthorne, "The Interior Past of an Acephalous Society: Institutional Change among the Balanta of Guinea-Bissau, c. 1400-c. 1950,"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政治的另一块基石。[①]

（四）桑给巴尔：超越时空的奴隶贸易伤痕

非洲的奴隶贸易具有涉及空间广和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前三个案例主要呈现了在奴隶贸易冲击下本土政治秩序和政治信任的演变情况。这三个案例主要集中在西非地区并覆盖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为了更好地呈现本文理论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解释力，还需要分析案例符合本文理论的三个条件：（1）空间位于西非之外的其他地区；（2）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前就存在奴隶贸易；（3）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后还存在过奴隶贸易。桑给巴尔恰好就是兼具以上特征的案例。在案例分析中，将桑给巴尔作为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来呈现。桑给巴尔经历了不同的统治历史，呈现了非洲社会在奴隶贸易结束之后的不同政治形态，有利于考察奴隶贸易对政治信任的持续性影响。

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可追溯至公元 8 世纪阿拉伯人在当地的统治。阿拉伯人将奴隶、象牙和香料贸易作为其统治支柱。桑给巴尔曾是东非奴隶贸易的“轴心”，拥有东非地区最大的奴隶贸易市场，是印度洋奴隶贸易和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据点。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前，桑给巴尔已存在高强度奴隶制，有些奴隶被卖到当地的香料种植园作为劳动力，还有些奴隶被贩运至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桑给巴尔是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后，奴隶贸易在桑给巴尔并未停止，当地的香料种植园仍继续购买奴隶作为劳动力。直到 1897 年，奴隶制在桑给巴尔才被正式废除。

桑给巴尔还曾是阿拉伯阿曼帝国的非洲殖民据点。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后，大量的阿拉伯商人涌入桑给巴尔。[②] 由于岛上的奴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奴隶贩子便带领商队到非洲内陆地区获取奴隶。桑给巴尔还是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蒂普·蒂普（Tippu Tip）的故乡，他从非洲内陆刚果盆地贩卖或抓捕奴隶，带回桑给巴尔的奴隶市场交易。奴隶商人在塔伯拉（Tabora）和坦噶尼喀（Tanganyika）沿海的乌吉吉（Ujiji）等地建立了贸易据点，方便运送奴隶和其他商品，仅在 1830—1873 年就有 60 万人从桑给巴尔被运往美洲。

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包括摧毁政治信任在内的一系列负面历史遗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奴隶商队在非洲内陆进行奴隶买卖和掠夺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一支奴隶商队在人数上可达几百人乃至上千人，其中包括上百名

---

① Robert Martin Baum, *Shrines of the Slave Trade: Diola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Precolonial Senegambia*, p. 59.

② Abdul Sheriff, *Slaves, Spices, and Ivory in Zanzibar: Integration of an East African Commercial Empire into the World Economy, 1770-1873*,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荷枪实弹的士兵，随同人员主要是运送奴隶的押运工。当地族群为了参与奴隶贸易，频繁对周边族群发起掠奴行动，进而引发族群冲突。加之奴隶商队与当地族群经常发生冲突，导致当地族群对外来和外族人产生了不信任乃至怨恨。欧洲探险者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曾目睹奴隶贩子在卢阿拉巴河（Lualaba River）的商贸市场屠杀三四百名当地黑人的情景。①

第二，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既有大量奴隶被带至桑给巴尔的奴隶市场，也有奴隶成为当地种植园的劳动力。桑给巴尔人见证了奴隶贸易的残酷，对那些处于统治地位且参与奴隶贸易的阿拉伯人产生了怨恨，两者间难以建立政治信任。1964 年，桑给巴尔革命爆发，非洲人推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约有两万多名阿拉伯人被杀。②

第三，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后，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并未停止，阿拉伯人继续在桑给巴尔经营香料种植园，种植园中也大规模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这导致奴隶在桑给巴尔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由于奴隶贸易的悲惨记忆以及当地政府未能有效干预其负面影响，曾作为统治者和奴隶贸易商人的阿拉伯人与作为奴隶的非洲人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七、结论

历史学者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将战争、革命、国家失败和瘟疫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四大变量，③ 而奴隶贸易触发了其中的所有变量。首先，奴隶贸易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些冲突对相关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其次，奴隶贸易打断了非洲政治的自然演化，摧毁了非洲的传统政治秩序，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和治理能力。最后，奴隶贸易及其引发的美洲瘟疫深刻改变了全球人口的分布，进而塑造了全球经济格局。此外，奴隶贸易还激化了社会不满和阶级冲突，为后续的革命埋下了种子（如海地革命）。可见，奴隶贸易对人类历史进程特别是国家建构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相较于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奴隶贸易并未得到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足够重视。

奴隶贸易遗产是非洲国家进行国家建构的重要阻碍。历史上参与奴隶贸易强度较高的族群在当下国家建构中严重缺乏政治信任。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具有

① Stuart Laing, *Tippu Tip: Ivory, Slavery and Discovery in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Medina Publishing, 2017.

② Sergey Plekhanov, *A Reformer on the Throne: Sultan Qaboos Bin Said Al Said*, Trident Press, 2004, p. 91.

③ Walter Scheidel, *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9.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全面性特征，对不同族群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在奴隶贸易的冲击下，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大多演变为以奴隶经济为基石的掠夺性政体。掠夺性政体频繁进行暴力掠奴的行为引发社会冲突，摧毁了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族群被迫卷入奴隶贸易过程，从受害者变为参与者，而传统政治领袖从奴隶贸易中获益，民众政治信任由此被不断腐蚀。奴隶贸易导致的低政治信任具有持久性，这种信任缺失在许多非洲社会延续至今。正因如此，它对非洲国家的国家建构构成了严峻挑战。当然，政治信任只是奴隶贸易对非洲现代国家建构影响的一个维度。① 未来还需要从奴隶贸易与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政治认同和族群关系等维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建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揭示奴隶贸易如何塑造了国家政治发展困境的真相，并为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非洲国家需要采取多种方式重建政治信任。首先，应正视和反思本土的传统领袖在奴隶贸易中的角色。没有本土政治精英的参与和共谋，大规模奴隶贸易难以发生。其次，国民教育在塑造政治信任中至关重要，非洲国家应帮助本国民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在其国内的历史教科书中如实介绍并反思本土行为者的过失，同时保护奴隶贸易的历史遗迹，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② 此外，设立“奴隶贸易受害者纪念日”并将其作为非洲国家的公共节日也是值得考虑的措施。最后，全力打击现代奴隶制。当前，非洲仍有 4900 万人深陷奴隶制，消除现代奴隶制是斩断奴隶贸易延续的关键。③ 只有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实施针对性政策，才能修复非洲民众的创伤，重建他们的政治信任。此外，国际社会也应协助非洲国家消除奴隶贸易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不应简单将非洲国家的发展困境归咎于治理问题，以免在对非洲的援助中开出错误“药方”；另一方面，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应注重消除负面历史遗产的影响，非洲各国的前殖民宗主国有责任出台援助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族群的政策。唯有如此，非洲国家才能摆脱奴隶贸易的历史阴影，实现迈向现代国家正轨的目标。

（截稿：2024 年 11 月　责任编辑：赵远良）

---

① 借由奴隶贸易而形成的掠夺性政体虽然通过战争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集权，但集权并没有促进非洲国家的建构，反而强化了掠夺性政体的属性。参见 Robert H. Bates，*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 51-53。

② 根据笔者对非洲留学生的访谈。部分非洲国家没有将奴隶贸易的历史在其教科书上如实呈现，在一些遭受严重奴隶贸易的西非国家（如马里），教科书上并没有反思本土行为者在奴隶贸易中所扮角色的相关内容。在坦桑尼亚历史教科书中，对奴隶贸易的介绍未提及非洲本土精英在奴隶贸易中的参与情况。参见 Tanzania Institute of Education，ed.，“The Concept of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pp. 74-85。

③ 现代奴隶制包括强制劳动、强制婚姻、性奴和童奴等，参见“Modern Slavery：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https：//freetheslaves. net/slavery-today-2/？gad_ source = 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tur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ould be undermined by the skew of the efforts. In such cases, IOs tend to adjust their cooperative policies. The extent of disagreement within IOs' bureaucracy and disagreement among member states further influence the policy adjustments. These points could be supported empirically with the case studies on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erefore, given the complex interests of the private sectors, their role in alleviating dilemmas of global governance calls for cautious examination.

【Keywords】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rans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uthor】 ZHENG Xin,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lave Trade and State-Building in Africa: A Mixed-Methods Study

HUANG Zhenqian (88)

【Abstract】 The slave trade is a profound historical scar that has ha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particularly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frica.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trus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how the slave trade has shaped Africa's political ecology and state-building processes. As an external shock, the slave trade, driven by the slave economy, triggered a chain reaction within African societies. Highly organized ethnic group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predatory regimes, using violence to capture slaves to sustain their rule. Meanwhile, less organized ethnic groups were plundered and even forc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lave trade. These dynamics exacerbated social conflicts,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and weakened people's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frica. The negative effects have continued to hinder 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inent. This paper employs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lave trade and African state-building.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level of popular political trust in regions with historically high slave trade intensit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slave trade on political trust has been perennial.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four case studies, reveals the specific processes of how the slave trade eroded political trust, illustrating that the historical trauma brought by the slave trade has been a crucial reason for the plight of modern state-building in Africa. This paper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complexities of African state-building and presents policy referenc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promote state-building by restoring political trust.

【Keywords】 slave trade, state-building, political trust, mixed methods, African studies

【Author】 HUANG Zhenqi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elf-Cultivation, Virtue-Based Persuasion and Just War: How the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Affects Foreign Decision-Making

PANG Ruizhi (123)

【Abstract】 The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oreign decision-making in ancient China.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the Pre-Qin period reveals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trand of strategic culture: the objective of settling the foreigners, the prioritization of self-cultivation and virtue-based persuasion over military force in achieving its goals, and the emphasis on prudence and justice in the use of force. However, internal tensions existed within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Over time, the argument of "the King does not intend to rule all the Yi" emerged and eventually gained prominence. Drawing on discussions of foreign policy recorded in texts from the Western Han, Norther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relative to the competing theories of dynastic cycle, Realpolitik, and unipolar stabili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had greater influence on foreign decision-making discourse than the competing the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unipolar stability theory. Specifically, decision-making became more proactive when guided by the argument of "settling the Yi", whereas it was more restra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rgument of "the King does not rule the Yi". Furthermore, self-cultivation and virtue-based persuasion were consistently favored over military force in achieving strategic goals. Lastly, while the principles of prudence and justice in the use of force were generally upheld,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principles—particularly when combined with the settling the foreigners argument—occasionally led to the undermining of caution.

【Keywords】 Confucian strategic culture, foreign decision-making, self-cultivation, just war, settling the Yi

【Author】 PANG Ruizh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